

郭嵩焘与芝加哥大学所藏稿本《沅湘耆旧诗集续编》

周 原

郭嵩焘(1818-1891)对湖南地方文化事业的贡献,举其要者有参与筹办湖南忠义录书局和编纂《湖南忠义录》;主编《湘阴县志》;与曾国荃共同主持湖南省通志局,主修《湖南通志》;以及参与创办长沙校经堂和筹办、主持长沙思贤讲舍等。另有一件就是主持编纂《沅湘耆旧诗集续编》(以下简称《续编》)。

研究者较少注意郭嵩焘对湖南地方文化的贡献,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郭半生远离家乡为官,其政治生涯中最有影响也最富争议的行事功过、思想论说多在涉理洋务方面,而他所处的时代是清政府被迫从闭关自守转向开放,中西经济利益和文化理念剧烈冲突的时代,研究者重视他的洋务思想与活动,实无可厚非。二是郭一生仕途坎坷,几起几落,屡次不得不以告病回乡为进退。而郭为地方文化事业所做种种,多是他退居湖南期间所为。居家期间不为研究者所重视,也很自然。但尽管不是研究的重点,为郭作传或年谱的学者们对郭在家乡的活动,如主持编纂《湖南忠义录》、主持湖南通志局、倡办禁烟公社、兴建船山祠堂及筹办思贤讲舍等,都会或多或少地谈到。惟有郭主持续编《沅湘耆旧集》之事却无人提及,因此鲜为人知。盖因该书从未刊刻,加之其稿本被认为已毁于战火,随着当年知晓其事者相继离世,此事渐趋湮没。

一、《续编》之起因

欲探讨《沅湘耆旧诗集续编》的编纂,需从《沅湘耆旧集》一书谈起。《沅湘耆旧集》二百卷,为湖南新化人邓显鹤编纂。邓显鹤(1777-1851),字子立,号湘皋,晚号南村老人。邓学识博通,然科场不顺,遂专心纂辑和著述,对收集整理湖南地方及湖南人士的文献用力尤深。该书冠以《沅湘耆旧集》之名,实为“湖南诗征”,广收自明初至清道光年间湖南各类人士的诗作,“凡得一千六百九十九人,诗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首”^①。所辑之诗乃邓氏倾半生之力,广泛

^①见《沅湘耆旧集》邓氏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690-169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据道光廿三年邓氏南村草堂版影印,2002年。

征集搜讨且精心校选所得。言及采访之艰难,邓在《沅湘耆旧集序例》中写道:“征到诸家全集甚少,或出自谱牒,或摘自方志,或采自岩洞,亦有家世写本,坊市俗刻……。”所收之人遍涉公卿宦臣,名流雅士,地方乡绅乃至监生布衣,夫人淑女,方外释道。同时,邓的儿子邓琮多年来专事搜辑明以前湖南人的诗作,得晋朝至元末之间诗三百三十一家共二千二百餘首,经邓显鹤校审,成《沅湘耆旧集前编》四十卷。《前编》与正编合计二百四十卷,辑魏晋以降至清道光中期湖南人士共二千多人的诗共一万九千多首,摭古采今,蔚为大观。该书发凡起例,开湖南一省诗作总集之先,且广采史志家谱,墓表行状,事迹生卒,师友渊源,撰为小传,以求“以诗存人,亦以人存诗,用备一方典故”^①。

《沅湘耆旧集》自道光癸卯(1843)刊刻以来(《前编》刻于1844年),便受到学人特别是湖湘人士的好评。曾国藩、魏源等近代名人对邓显鹤所纂《沅湘耆旧集》无不赞赏有加^②。该书为保存和彰显湖南文献,确有筚路蓝缕之功,而邓氏为搜求整理湖湘文献穷其一生,不仅被人们所称道,也为后来有志于湖南文献者提供了榜样。《沅湘耆旧集》之后,便有湘潭人罗汝怀(研生)编纂《湖南文征》之举,更屡有为《耆旧集》续补之议。郭嵩焘便是一个有志于为《沅湘耆旧集》作续的湖湘人士。他所主持的续编,历时数十年,最终在其身后数年得以完成。

二、伦明留下的线索和疑团

目前找到的关于《续编》的最明确记载,见于伦明所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伦明为近现代著名藏书家,精于版本、目录,曾在北京大学、广东岭南大学任教授。他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最初以连载形式,发表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的《正风》半月刊^③。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雷梦水先生校补的单行本。在伦明的书中,他将《续编》之事记于“周铎诒”条目下,云:

耆旧沅湘两续编,荒坟拾骼赖筠仙。

百年文献惟餘此,遽莫诗魂散弹烟。

永明周笠樵中书铎诒,辑《沅湘耆旧集续编》,始邓南村教谕显鹤,迄郭筠仙侍郎嵩焘,凡七百餘家,合前编补、初集补,都百九十卷。先是侍郎费二十餘年之力,搜辑已刻未刻诗,凡千餘册,拟续南村之书,未果。因以属之罗研生、吴南屏、张力臣,亦未就,再属笠樵为之。时光绪己丑,侍郎主

①见《沅湘耆旧集》邓氏自序。

②参阅曾国藩撰:《邓湘皋先生墓表》,见《曾国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19-322页;魏源:《致邓显鹤信》,《魏源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第十二册,第748页。

③参阅伦明著、雷梦水校补:《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思贤讲席，笠樵为监学。至乙未，书始成。自序称例依邓氏，意主摭佚，如王湘绮辈，亦不及焉。笠樵歿于辛亥后数年，稿藏未刊，为易寅村所得。易寓上海，壬申之役，其居毁于火，未知殃及否。同时有吴称三德襄者，同时受侍郎之属，同时葺事，但异其名曰《道咸同光四朝诗抄》，实一书也。稿为醴陵傅钝安所得，终于丁巳七月长沙日报之火，侍郎所藏诸家底本[本]，早散佚。

通过伦明的诗文，我们可以得知：1)《续编》为周笠樵（又作荔樵，即周铤诒）所辑，成于光绪乙未年（1895）；2)该书“都百九十卷”，续编之外，还含有前编补和正编补；3)续编之役，旷日持久，先是郭嵩焘经二十余年搜讨，所谓“荒坟拾骼赖筠仙”，欲续未果，继而交待罗研生、吴南屏、张力臣等人从之，亦未成，再于光绪己丑（1889）年交周笠樵来做，终于完成；4)笠樵之稿未刊，为易寅村所得。而易宅在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又称“淞沪抗战”，即伦明所称“壬申之役”）中毁于战火，书稿恐与易宅俱焚。

伦明的记载简要明晰，至关重要，但也留下一些疑团。其一是关于书的编者：首先，郭嵩焘在本人欲续未果后，曾交给多人接续其事，这些人特别是罗研生、吴南屏、张力臣三人是先后接踵其事，还是各有分工，同时为之？再有，除伦明提到的四人之外，尚有无他人参与？还有，在后来的编纂中，郭是否亲自参与其事？其二是关于编书所费时间：《续编》志在收集道光中期以降历朝湘人的诗作，搜求欲广，诚非易事，实不可一蹴而就。然在郭本人搜求积累二十余年，又先后请多人参与的情况下，编纂工作何以仍如此旷日持久，以至于该书在郭身后四年始成？其三是稿本之去向：伦明称易在上海之宅毁于战火，慨叹书稿恐难逃厄运，吟之“遮莫诗魂散弹烟”。然而他并不确定书稿是否真被殃及，又给后人留下一线希望。

三、芝加哥大学藏稿本《沅湘耆旧诗集续编》

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稿本《沅湘耆旧诗集续编》一套。全书含《沅湘耆旧诗集续编》一百六十三卷，《沅湘耆旧集补编》二十一卷和《沅湘耆旧集前编补》三卷，加卷前目录两卷，共计一百八十九卷。目录卷端未署编纂者，正文则以邓显鹤诗为开端。全书现存六十五册，分装十四函。

《续编》收诗起于“南村诗老邓显鹤”，迄于“养知先生郭嵩焘”。书前目录共著录一千二百五十五人（不含仙鬼杂诗）。该书体例基本仿照邓氏正编，故只选已故之人，在世者不收。所收不以地位门户设限，官宦名家之外，地方乡绅、教谕监生、布衣闺阁、僧道之诗乃至仙鬼谣谚均在搜选之列。如是，自道光中期以降，至光绪中期辞世湘人的诗作，汇成一集，得诗一万六千二百八十八首。所收接续邓氏正编，成为涵括清代中叶至光绪中后期的“湖南诗征二编”。除此之外，《沅湘耆旧集前编补》收四十五人，《沅湘耆旧集补》收五百零二人，故此书还为邓氏正编及前编补入五百多人的诗作共一千七百四十四首。全

稿合计收一千八百零二人的一万八千零三十二首诗。

此书约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时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的钱存训教授经手采进。该书原属台湾大学教授李宗侗先生收藏,由其家属联系转让我馆,一同采进的还有李氏所藏明刊本,其他稿本、写本多种,约二百餘册^①。李宗侗字玄伯,是晚清重臣李鸿藻的孙子,易培基的女婿,曾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

检视馆藏稿本,可见几种印章。其中“生斋台湾行篋记”阳文篆字方印为李宗侗藏书印,屡见于本馆同批购进之书。另在《沅湘耆旧集前编补》卷一的卷首钤有阴文小方印“易漱平”。易漱平为易培基之独女,李宗侗之妻。故芝大所藏正是昔日易氏藏本无疑。

芝大的这套稿本一直与东亚图书馆的中文善本收藏在一起。虽然该书到馆后不久即得到编目,读者可以通过馆藏卡片目录查到此书,但由于缺乏专门的介绍,外界对本馆收有此书,几无所知。直到1987年,时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访问学者的上海图书馆善本部专家沈津先生应钱存训教授邀请来我馆短期访问,翻检馆藏中文善本,鉴定该书为本馆所藏最有价值的珍本、善本之一。其后,沈先生专文系列介绍访美期间所见各图书馆的中文善本,也介绍了此书^②。1998年,钱存训教授在出版个人文集《中美书缘》时,选出沈先生所撰本馆中文善本题记十种,单独成文,征得同意,附录于该书^③。此后,朱政惠先生也曾在《美国清史资料及其研究述略》一文中,提到本馆这一稿本^④。2005年秋冬之际,由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委员会主任安平秋教授带队的一组古籍研究专家,到密执安州立大学开会,顺访芝加哥,调看了包括《续编》在内的几种本馆中文善本。回国后,访美成员之一,北京大学漆永祥教授查考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关于《沅湘耆旧集续编》的记载,遂撰文进一步介绍我馆所藏《续编》稿本和伦明所定该书的编纂者^⑤。漆教授的文章为细考该书编纂者和编纂经过提供了重要的引导。

四、罗研生、吴南屏、张力臣与《续编》的编纂

由于馆藏稿本书前无序,又未署编者之名,在编目时,该书著者被误录为邓显鹤。找到伦明的记载,不仅有了周铨诒为该书编纂者之说,而且获得了进

①钱存训:《留美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48页。

②沈津:《美国所见中国善本书(6)》,载于《图书馆杂志》1989年第2期,第58-59页。

③沈津:《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善本十种题记》,收于钱存训著《中美书缘》,台北:文华图书馆管理资讯有限公司,1998年,第233-248页;又见于沈津:《书城风弦录—沈津学术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2-230页。

④朱文分上、下两部分,分别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1期,第21-27页;第2期,第20-26页。

⑤《〈沅湘耆旧诗集续编〉及其编纂者小考》,《文献》2007年第4期,第186-189页。

一步追踪该书的编纂者,解开其成书经过之谜的重要线索。依伦明所言,郭嵩焘在本人欲续未果之后,曾将此事交给罗研生、吴南屏、张力臣等人来做。本文即以此为入口,查考了包括《郭嵩焘日记》在内的许多相关文献,做了一系列考证^①。

罗研生(1804—1880)名汝怀,字念生、研生,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七年拔贡生,候选内阁中书。罗博学多识,淡视利禄,于“六艺故训,地理沿革,古今山水源流,历代法制、氏族、金石篆隶,靡不研通”,被当时湖湘大家曾国藩、何子贞认为“有国朝经师之遗风”^②。其著作有《湖南褒忠录》、《湖南文征》、《绿漪草堂诗文集》及《研笔馆词》等刊行于世。罗氏与郭嵩焘过从甚密。郭氏日记中时常提到与罗的交往,所存诗集中有十馀首与罗交往应答之作。郭氏诗文集所收书牋中,也有《与罗研生》一通。罗氏七十寿,郭撰有《罗研生七十寿序》贺文一篇。罗氏卒,郭嵩焘为其撰墓志铭。

罗氏早年曾协助邓显鹤编纂《沅湘耆旧集》(即正编),此事邓氏在《耆旧集》自序中有说明^③。罗氏还曾参与《湖南忠义录》的编纂,且贯穿始终,对该书的成书贡献最巨。罗在为编纂《湖南忠义录》(刊刻时更名为《湖南褒忠录》)四处辑资料的同时,刻意搜求自元明以来湖湘人士的文章,成《湖南文征》二百卷。此书被广泛誉为继邓氏编纂《沅湘耆旧集》后,彰显湖南文献的又一部重要著作。有与邓氏《耆旧集》一诗一文,“并垂天壤间以无坠”之赞^④。关于罗氏续修《沅湘耆旧集》的记载,可见于他的儿子罗克进为其撰写的行状:

先是,新化邓氏辑沅湘耆旧诗集,府君助其搜讨,多所阐发,而搜辑邑中先哲朋旧之诗为八卷,曰《潭雅》。后更征集先正遗文,续修沅湘诗集,遗文逸藻更数十百年,虽在子孙不及知者,府君往往得之蛛丝蠹窟中,作合之奇,宛有前缘焉^⑤。

由此可见,罗氏续修沅湘诗集大致与其为编撰《湖南文征》而“征集先正遗文”同时进行,采访到的湘人著作遗篇,文则选入《文征》,诗则留以续修《沅湘耆旧集》备选。然罗氏编撰《湖南文征》其实是他编写《湖南忠义录》的“副产品”。对此,李瀚章所做《湖南文征序》中有所说明:“同治乙丑,瀚章恭膺简命,巡抚是邦,时方设褒忠局表章死事者,湘潭罗研生中翰实综其事,又以

①在考证过程中,蒙正在我校访学的台湾大学中文系张宝三教授帮助查考部分资料,且得与之切磋,多有获益,谨致谢忱。

②郭嵩焘:《罗研生墓志铭》,《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第444—446页。

③邓显鹤《沅湘耆旧集》自序云:“此书编辑之始,所与商榷校订者,鄞县沈粟仲道宽,长沙毛青垣国翰,湘阴左仲基宗植。搜访之勤且慎,则湘潭罗研生汝怀,张玉夫声玠,武陵杨杏农[珍]之力居多。”

④李瀚章:《湖南文征序》,载于《湖南文征》卷首,同治十年(1871)原刊本,叶二。

⑤《绿漪草堂文集》卷首,湘潭罗式常刻本,1883年,叶十二。

其暇辑《湖南文征》二百卷。”^①

可见,若无开设褒忠局,编撰《湖南忠义录》之举,罗研生很难得此便利,广搜湖湘人士的著述,编纂出《文征》并从事续修《耆旧集》的工作。而当年主持筹办褒忠局,延揽罗研生等人编撰《湖南忠义录》的正是郭嵩焘。根据郭嵩焘年谱,郭于咸丰十年(1860)三月在京城任南书房行走时,奏请回籍就医,获准。同年六月抵家^②。翌年秋,湖南巡抚毛鸿宾拟开设褒忠局,编纂《湖南忠义录》,为在所谓“太平天国”之乱和后来“平乱”中丧生的湘军将士、地方官员和乡绅烈女作传。毛邀请郭嵩焘参与创办褒忠局,并请他主持^③。郭嵩焘接手其事后,一方面延揽人才,一方面四处联系并督促参加人员遍访湘军各营,广泛收集资料。同时,又与褒忠局的同事们商讨忠义录的编纂体例。关于此事,在这一时期郭氏与友人的书信中屡有提及^④。例如,在给邓伯昭的书简中,郭写道:

仆疾病无状,中丞以编辑《忠义录》,强起一与其议,窃幸得从公与南屏、研生等诸公后,搜求奇节卓行,征事述文,既可陪侍德教,抑亦无妨于隐退之义,不复敢辞。

郭氏主持褒忠局局务的时间不长,约略一年。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间,经李鸿章保奏,郭赴江苏接任苏松粮道,协助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管理厘捐总局及有关军务。在离湘以前,郭嵩焘已将编纂《忠义录》之事交予罗研生。这样看来,伦明所言郭氏请罗研生接续其后,续编《耆旧集》之事,当在郭主持褒忠局局务的这一年间,即1861年秋至1862年初秋之间。

根据伦明之说,受郭嵩焘之嘱参加编书的第二人,为吴南屏。吴南屏(1805-1873)名敏树,字本深,号南屏,晚号梓湖老人,湖南巴陵(今岳阳)人。道光十二年举人。吴自少读书博采众家,长则好治古文,又善诗词。因家境殷实,加之个性特立,不拘仕途。吴氏著述甚丰,其文章风格秀逸,见解力求岸异,不闾于世俗,有《梓湖文录》、《梓湖诗录》等存世。吴与郭嵩焘交往颇多,郭氏诗集中存有许多首与他交往唱和的诗作,文集中亦有《与吴南屏舍人论罗水出巴陵》和《跋吴南屏<鹤茗堂记>后》两篇,以及“与吴南屏”书札一通,而郭氏日记中提到吴南屏之处,更是不胜枚举。吴氏歿,郭嵩焘撰《吴南屏墓表》赞之:“湖南文章二百年之盛,推曾文正公及君。而君意趣旷然,无忤于物,而物亦卒莫浼,有得于古文人之风。”^⑤

有趣的是,吴南屏当年亦曾受郭嵩焘之邀进入湖南褒忠局,与罗研生等人

①李瀚章:《湖南文征序》。

②参阅郭廷以等著:《郭嵩焘先生年谱》(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第156-164页。

③《郭嵩焘先生年谱》(上),第194-195页。

④如《与周寿山》,《与吴南屏》,《与邓伯昭》,《与罗研生》,《与阎丹初》,《致刘霞仙》,《覆王伦霞》,《覆罗小溪》等,见《郭嵩焘诗文集》,第152-168页。

⑤《郭嵩焘诗文集》,第471页。

一同参与《湖南忠义录》的编纂工作,后因在《忠义录》的编纂体例上与郭嵩焘意见相左而力辞。此事在郭氏文集上的《与吴南屏》和《与罗研生》等信件中均有所叙述。但吴氏参与续编《沅湘耆旧集》的工作则发生在他退出《忠义录》之事约近十年后,而他的这一次参与还是与郭嵩焘密切相关。

郭嵩焘在同治元年(1862)再度出山,任苏松粮道,辅佐江苏巡抚李鸿章后,仕途一度颇为顺利。同治二年先是奉旨兼督松浙盐务,未久,拔两淮盐运使。几个月后,又由新任两广总督毛鸿宾保奏,诏赏三品顶戴,命署广东巡抚^①。郭在署理广东巡抚任上三年,终因与后来兼署两广总督的瑞麟不和等原因,再生退意。在围剿进入广东境内的太平军残部的战斗中,被认为有失职之嫌,受到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参奏,在同治五年遭解职,被清廷诏命回京,另候简用。郭遂奏请回湘养病,未去京城候遣。他于同年秋回到家乡湖南,开始了历时八年,再度隐退的生活。

郭回家之后并未完全赋闲,先是着手编写《湘阴县志》,初稿于同治七年草成,郭先寄曾国藩校阅。后又逢湖南巡抚刘昆是年拟修湖南通志,刘与布政使李榕同请郭嵩焘和正在家乡养病的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参与谋划,制定通志局章程。同年阴历十二月(即1869年1月),湖南通志局开局,由郭嵩焘主持局务。曾国荃在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致其兄曾国藩的信中写道:

省城志局设府学尊经阁,十二月一日开局,南屏、次青均允随筠仙住局,子寿太史亦初三、四可到,罗研生则仍住荷花池。吃志局薪水,办志局之事。弟则不受薪水,亦不任事,但订多到局几次,联络在局之人心,搪塞局外之风浪,以消口舌于未萌而已。^②

由此可见,在通志局创办之初,吴南屏曾被聘入,并随郭嵩焘住在省城志局。但他似乎并未在志局中久留,而吴氏参与续修《耆旧集》,则更是在几年以后。郭嵩焘在吴氏墓表中说:

曾文正公允善君之文,欲使治幕事,辞不赴。已而走视文正公军中,文正公大欢,赋诗曰:“黄金可成河可塞,惟有好怀不易开。”未几而文正公薨。逾年,君亦病。适有复修《沅湘耆旧集》之役,遂卒于长沙书局。^③

曾国藩卒于同治十一年三月,吴南屏则于同治十二年八月卒于长沙书局。如以郭氏所撰墓表为准,吴氏参加续修《耆旧集》的时间当在曾卒后一年,即同治十二年。然根据查考到的吴南屏致王子寿(柏心)的手札推断,此事应发生于同治十年或十一年。吴在该信中写道:

敏树东游归后,抱病连年,久却问聘。本年以刊刻邑乘,就工省下,在

①参阅曾永玲《郭嵩焘大传》附录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4-385页。

②《郭嵩焘先生年谱》(上),第441-442页。

③《郭嵩焘诗文集》,第470页。又:查《曾国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所收《赠吴南屏》七言古诗,该两句为“苍天可补河可塞,只有好怀不易开”。

事诸公，强复迁入，且令续辑《耆旧诗编》，现在刻钞卷帙，积案盈箱，阅读之下，大苦谜闷^①。

此信末未具年，但具“十一月初十日”。信中提到，“拙著诗文前年已妄付剞氏，迟未呈”。查敏树所著《梓湖文集》八卷及《梓湖诗集》六卷，卷首一卷均刻于同治八年（1869）。依此推断，写信之时应为同治十年。但如前所引，信中言及“本年以刊刻邑乘，就工省下”。吴是巴陵人，“邑乘”所指应是《巴陵县志》一书。该书署吴敏树等纂，严鸣琦、潘兆奎修，全书三十卷并卷首一卷，共十册，同治十一年刊刻（一说同治十一年修，十二年刊刻）。究竟吴氏因刊刻《巴陵县志》的需要来到省城之后，再次被书局的在事诸公拉入并参与续修《耆旧集》的具体时间是起于同治十年还是十一年，仍需进一步细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绝非同治十二年。该信署“十一月初十日”，收信人王子寿卒于同治十二年五月^②，而寄信人吴南屏则卒于同年八月。

此后，续编《耆旧集》的工作再度陷入停顿，但停顿的原因却与吴氏的仙逝干系不大，而是因为郭嵩焘的再度出山。同治十三年六月（1874），为因应海防与洋务方面的需要，清廷诏命郭嵩焘、杨岳斌、曾国荃、丁日昌等人入京候旨遣用。郭于十月下旬启程赴京^③。他尚未抵京城，年仅十九岁的同治帝驾崩。翌年正月廿日，光绪帝继位。郭于正月抵京，二月诏授福建按察使。他五月抵闽上任，七月又被任命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奉召回京。十一月诏授兵部左侍郎，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④。郭于光绪二年（1876）启程赴英，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一任驻外公使，先驻英国，后成为兼领英法两国的钦差大臣。

郭嵩焘这一回离开家乡共约五年。光绪四年，郭再度因心冷于官场上的倾轧，上书总署告病求去。该年底清廷派人接替郭职，郭于光绪五年闰三月抵家。虽然清廷要求他病体稍痊，即行来京供职，但郭自此未再重返仕途，也至死未离开湖南。

续编《沅湘耆旧集》的工作，由于郭嵩焘的返乡得以再度开展。这一次协助他办理此事的是张力臣。

张力臣名自牧（1831—1884）^⑤，字力臣，又作笠臣，湖南湘阴人。张氏博览

①《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24年。

②参阅郭嵩焘：《王子寿先生墓志铭》，《郭嵩焘诗文集》，第450—451页。

③参阅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189—201页。

④《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第203—211页。

⑤关于张自牧（力臣）的生卒年，有些文章、书籍中列为不详、待考，有的则弄错。如《湖南历代人名词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张自牧条目下列其生卒年为1832—1886。根据郭嵩焘光绪十年（1884）二月初二日记云：“忽报张笠臣是日卯刻物故，一往哭之。”知张卒于1884年。又根据郭光绪九年九月初九的日记中谈到张笠臣时年五十三岁（虚岁），推知张应生于1831年。

好学,聪明能干,颇受郭嵩焘赏识。郭出使英国前曾保举他为二等参赞随行^①,并获总署批准^②。但因时任湖南巡抚的王文韶上奏反对,遂被诏令阻止,未能成行^③。张氏喜欢研讨外国史地,虽未能出洋,但对洋务自有一番心得,先后撰著《瀛海论》和《蠡测卮言》,是所谓“西学中源论”的鼓吹者。郭虽不完全同意张的论说,却很看中他的才华,谓:“力臣于洋务所知者多,由其精力过人,见闻广博,予每叹以为不可及,然犹惜其于透顶第一义未能窥见。”又云:“力臣聪明胜人万万,闻言即能深求,不易得也。”^④张与郭嵩焘私交颇深,两家又是姻亲,故很得晚年归隐在家的郭氏之信任。两人经年的交往,郭在日记中多有记述,赠答应和的诗作,也屡现于郭嵩焘诗集晚期的作品中。

关于张力臣参与续编《耆旧集》之事,可见于郭嵩焘在光绪六年正月廿八日的日记,云:

廿八日。陈右铭、张力臣过谈。以陈国卿寄到廖容斋《铸铁斋遗诗》交张力臣选入《续沅湘耆旧集》。

此时距郭嵩焘返乡未久,可知郭一俟在家乡初步安顿停当,即重拾续编之业,并囑张力臣任其事。检视馆藏稿本,百十一卷收廖可受诗一百二十首。

另有一则相关的记载见于同年二月廿八日郭的日记:

廿八日。雨,寒。张力臣过谈:田明山海筹著有《木樨香舍诗钞》六卷;瞿永禧熙臣有《可与不可山房诗草》一卷,吴樾桥为之序,称其早废学,游幽并间,习为诗,出语自然有风趣。逾岁见之,而已哀然成帙矣。勤勤为之,锲而不舍,所至岂可量哉。嵩焘旧题一绝句:十载幽并意气雄,谈诗赌酒健儿风,归来万事都零落,惟有残编伴病翁。此两种并求加载县志,当存之。

查郭嵩焘所编、光绪六年三月开雕的《湘阴县图志》,其艺文志中著录有“《木樨香舍诗钞》六卷,岳州镇中营游击田明山撰”^⑤。知郭雷厉风行,将该诗集在县志开雕前(或开雕期间)补入艺文志。但艺文志中未见瞿永禧《可与不可山房诗草》,未知何故,待考。再查馆藏《沅湘耆旧诗集续编》稿本,见第一百二十六卷中收有瞿永禧诗四首,其小传曰:“永禧号熙臣,湘阴人,监生,著有《熙臣诗草》。”然不见田明山的诗作。估计是因为《续编》稿本成稿时,田明山还健在,而瞿永禧已过世。故收瞿而不收田,正合体例。

由此可知,其时张力臣不仅辅佐郭氏续编《耆旧集》,还协助他编纂《湘阴

①参阅光绪二年九月十五郭氏日记,《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页。

②《郭嵩焘先生年谱》(下),第550页。

③《郭嵩焘先生年谱》(下),第565页。

④光绪五年闰三月十九郭氏日记,《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855页。

⑤见《湘阴县图志》卷三十,光绪六年湘阴县志局刊,叶三十四。

县图志》。

另有一则张力臣与《续编》的相关记载,见于郭嵩焘在张卒后五年的光绪十三年(1887)六月十一日所记日记,云:

任小棠、朱蕤卿、陈尧辅、易铁樵、易叔子过谈。易叔子以曾交意城手^①,求选入《耆旧续编》,内杨大山、柳南洲二人诗稿^②,系其家写存本……检还不可得。盖自张力臣以来,若此类遗失者多矣。选稿二箱,尚取存书斋也。

此条记载不仅再次说明郭氏曾嘱张力臣负责编选《耆旧集续编》多年,并且说明自光绪十年张力臣死后,续编之事可能略有停顿但并未停止。

检视本馆所藏《沅湘耆旧诗续编》稿本,发现全稿各卷不但抄录的字迹风格和工整程度很不相同,而且抄录使用的纸张也不统一,如所用纸张大多为一般的白棉纸,包括毛边的白纸,但也有一些印有整齐紫色、朱色方格的纸。全书使用纸张的长短大小、新旧程度也不划一,推测抄录工作可能行于不同时期。

在有方格的多种纸张中,有的版心还印有字样,显然是专门的文牍用纸。其中一种,版心刻有“无知知斋”字样。查郭嵩焘诗集中,有《题张笠臣<无知知斋诗>册》一首^③。《湘阴县图志》的艺文志中也著录有“《无知知斋集》二十四卷”,题“布政使衔浙江候补道张自牧撰”^④。可见“无知知斋”应为张力臣的斋名。而用印有“无知知斋”字样的纸所抄录的诗页,见于书稿中多处,既有较靠前者,如卷十二,也有较靠后者,如卷百五十八、卷百六十一等等,每次若干页不等。至于录入其上的诗作是否为(或部分为)张力臣亲笔抄录,尚待细考,然其作为张力臣参与续修的有力佐证,则灿然无疑。

五、再接其事的郭子潜、王壬秋、周荔樵

如是,围绕着罗研生、吴南屏、张力臣三人续修《耆旧集》的疑问已基本廓清。他们虽然都是郭嵩焘的朋友,在同治至光绪初年间又都为郭嵩焘做过一些事,但在续编《耆旧集》的工作上,却基本上是接踵其事,而非同时分头操作。

依伦明之说,他们三人之后的接续者应该是最后竣其事的周铎诒。然笔者通过翻检郭嵩焘的日记,又有新的发现:周铎诒之前,还有两人先后受郭嵩焘之嘱兼理此事。这两人就是郭子潜和王壬秋。

郭子潜名庆藩(1844-1896),字孟纯,自号子潜,湖南湘阴人。郭庆藩是郭嵩焘的弟弟郭昆焘的儿子,郭嵩焘的亲侄子。清末举人,官通判,曾在浙江任知

①意城指郭嵩焘之弟郭昆焘,号意城。

②检视稿本卷百三十四收有杨世俊诗九十四首,小传云:“世俊字大山,……著有《大山诗草》。”

③《郭嵩焘诗文集》,第722页。

④见《湘阴县图志》卷三十,叶三十三。

府。光绪七年(1881)黎庶昌出使日本,曾荐其为参赞,因病未能成行。后以道员改任江苏。郭博览群书,犹喜为诗,又专攻《说文解字》。有《说文经字考辩证》四卷、《说文经字正谊》四卷、《庄子集释》二十四卷和《十二梅花书屋诗草》八卷等传世。

因是郭嵩焘的至亲,庆藩颇得郭的信任,特别是在郭的晚年。在他的日记中,郭嵩焘总是以庆藩的自号子瀚或子敬称呼其侄。有关子瀚涉及续编《耆旧集》的记载,目前只在郭嵩焘的日记中找到一处,记于光绪十年七月十二日,云:

十二日,接胡浴生一信。亦致成静斋一信。子瀚过谈,知所编次《沅湘耆旧集》补编、续编目录已成。病中亦能清理及此,精神才力均是难得。

虽然只找到这一条,却相当重要。这是因为:1)张力臣卒于这一年的二月初二。此记载说明张死后,续编之事并未完全搁置,郭的侄子仍在经手。至于子瀚是在张力臣亡故之前就已参与,还是张身后才介入,并不重要。2)子瀚已将补编和续编的目录完成,这标志着续编工作几近完成。检视馆藏稿本,其结构为先续编,再补编,再前编补^①。而目录所载为各卷所收之人,每人名下所收诗总数,如:某某十首;某某一首。大致按各诗主可考年代排列。目录已成,说明书稿已规模初具,即使不是定稿,也应有一个较完整的初稿了。

在郭的日记中,这之后一直到光绪十四年,只见到前面提到的光绪十三年六月十一日的一条记载,所云为易叔子来找以前为求选入《耆旧续编》而交来的包括杨大山、柳南洲等人的诗稿,郭检不可得,并亲自“选稿两箱”,似乎要亲自看稿,并未提及有他人辅佐。

到光绪十四年,郭终于又找到了一个颇为理想的人选,这个人就是在近代湖南以至全国文坛上颇具名气的王壬秋。

王壬秋名闳运(1832-1916),早年名开运,字纫秋,又作壬秋,号湘绮、朗斋,自号湘绮老人,湖南湘潭人。咸丰七年举人。曾入曾国藩府为幕僚,后受四川总督之请执掌成都尊经书院。此后,又先后主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并主办南昌高等学堂。宣统年间加授翰林院侍讲。民国二年受袁世凯之聘,任国史馆馆长。王长经学,擅诗文,著述甚丰。有《楚辞注》、《尚书笺》、《春秋公羊传笺》、《礼记笺》和《湘绮楼文集》、《湘绮楼诗集》、《湘绮楼日记》等刊行于世。王与郭交往多年,在郭的日记中多有记述。郭的诗集中亦收有《中秋日王壬秋邀同张笠臣过朱香荪饮》、《次韵王壬秋碧浪潮看月遇雨小步还城行》和《六月三日王壬秋集饮碧浪潮》三首。

是年,王正应郭嵩焘之聘,主讲长沙思贤讲舍。思贤讲舍是郭嵩焘一手创建的书院,其意为为湖南培养经世致用之人才。讲舍于光绪七年(1881)正式开馆,郭亲任第一任主讲,又为讲舍议定学规,并聘左长卿为监院。书舍除传授

^①前编补仅为三卷,订为一册。

经史词章等传统学业外,还加授算学、制造等新式课业。开馆后,郭一直都在留意为讲舍延揽合适的主讲,也曾先后聘数人为之。郭对王闾运的才气、博学和文笔向为推崇,几次与王联系,希望他来主讲思贤讲舍,均未成功。直至光绪十三年五月,时王闾运正在长沙,郭嵩焘再度诚聘,并以王不肯接受主讲之名,换之以代郭主持的名义,终获王的应允^①。翌年初,王接掌思贤主讲。

关于王闾运兼理续编《耆旧集》之事,见于郭光绪十四年二月廿一的日记:

廿一日。阴。接文蓝舫、李华卿、陈子浚信。亦致王壬秋、周荔樵信。属王壬秋检校《续编沅湘耆旧集》,令陈子浚、袁笃裁、周卓群、陈树藩、庄凤喈、郭骥卿、易翰芹分司校对缮写,料理讲舍之前厅以居之。壬秋适以是日赴湘潭,乃属荔樵暂行经理。

以郭日记提供的时间,查对王闾运的《湘绮楼日记》,找到许多条相关记载。其中二月十九日一则云:

十九日。晴。午前在家点史,倍书,修书。筠仙来言选诗事。

而二月廿一日至廿四的日记则较详细记叙了王廿一日乘船“还乡侍祠”,至廿四日方回长沙之事^②,与郭廿一日的日记中所记“壬秋适以是日赴湘潭,乃属荔樵暂行经理”正合。

读王壬秋二月廿五日至五月十二日的日记,共检出有“看诗”、“看湘诗”、“看诗五本”和“选诗”等记载约二十处,其中绝大多数为看诗,与郭所记“属王壬秋检校《续编沅湘耆旧集》”相合。说明此时《续编》已大致编定,虽然还有一些选诗入集的工作,但此时郭最需要的是借助王闾运的学识“检校”所选之诗是否恰当,有无错漏之处以及审读、补改诗主小传等。

在四月十八日的日记中王闾运写道:

十八日。晴,热。馆课毕,周荔樵来取钞诗去。

周来馆内取抄好的诗,又与郭日记中所云,校对抄缮在讲舍前听分司进行相合。另在郭嵩焘四月廿六日的日记中也记有:“周荔樵见示《续耆旧集》钞本,言发抄五日,所得不逾三四叶也。”

王闾运的《湘绮楼日记》中,光绪十四年六月至十二月之间付阙,故无从查考十四年下半年中王兼理续编的细节,甚憾。而检读光绪十五年王的日记,再不见与续编相关的明确记载。盖因王壬秋主讲思贤讲舍期为一年,期满未续,他自然也就不再参与续编的工作了。查郭嵩焘日记,光绪十五年二月十三

①参阅郭嵩焘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十和五月十五之日记,《郭嵩焘日记》第四卷,第714-715页。并参阅《湘绮府君年谱》第三卷,载于《王湘绮先生全集》(1923年刊印于长沙),叶十六。

②见《湘绮楼日记》,光绪十四年戊子,商务印书馆,1927年,叶八,收在国家图书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五十九册,线装书局,2003年。

日记：

思贤讲舍开馆，与熊鹤村、熊鹤阜、陶少云、黄植斋送学，因陪院长王实丞、监院周荔樵小酌。

可见王闾运不再任职思贤讲舍，而周荔樵时为监院。

在郭嵩焘光绪十五年的日记中，共找到二则与续编《耆旧集》相关的明确记载。一则记于正月二十七日，云：“阎季蓉信由李蓉镜带到，并致送向修梅《秦人宅藏稿》四册，求选入《耆旧集》。”另一则为八月初二日，云：“永定王辑唐呈阅其尊人王淡吾遗诗，谋选入《耆旧》续集。”在郭嵩焘的诗集中，收有《题向修梅〈秦人室诗册〉》一首。检视本馆稿本，卷七十七收有向修梅的诗一百八十七首。

郭的这二则日记中，未提将谋选的诗交予某人办理，似乎是郭在亲自操持。然伦明的记述中曾言：“……亦未就，再属笠樵为之。时光绪己丑，侍郎主思贤讲席，笠樵为监学。”光绪己丑即光绪十五年，此时王闾运已离开，暂无人接替，仍由郭主思贤讲舍，而周荔樵为监学。如此看来，在王闾运离开后，郭嵩焘就将续编之事交给了周荔樵接掌。

周笠樵名铨治，字仲泽，号笠樵，又作荔樵，湖南永明（今江永）人。周幼庵刺史之子。同治十二年拔贡生，官至中书。铨治癖金石，好篆刻，长书法，喜吟诗。与其弟奎治辑有《共墨斋藏古玺印谱》、《净砚斋觚印录》、《永明岳色堂印董》等。其一生作诗甚富，惜多散佚。有后学黄冰选刊《旷斋遗诗》，收其诗约二百首^①。周是郭嵩焘的晚辈，光绪五年（1879），周的次女许配郭之长孙^②，结为姻亲，从此更得晚年郭嵩焘的信任。周与郭的交往，在郭嵩焘日记中多有记述。郭的诗集中亦存有《答周荔樵〈题食笋斋诗后〉见赠》等三首与周赠答唱和的诗作。周的父亲周昂奎（幼庵）过世，郭撰墓志铭。

王壬秋离开后，在郭的日记中，将续编之事交予周荔樵办理的明确记载，见于光绪十六年四月初一，云：

杜仲丹以善化王耘蓬逢年孝廉诗稿二本交《续选耆旧集》局，因检书房所藏各集，凡五种：一、常宁王卜子祚隆《一峰遗草》一册；一、湘（湘）[乡]言云笙友恂孝廉《琴源山房遗诗》一册；一、善化黄倬恕皆宗伯《介园遗诗》二册；一、宁乡赵震青璘《一鹤山房集》一册；一、湘潭郭正斋新楷《覆瓿草》一册，并交易华卿带送周荔樵。又续交左孟辛诗文稿二本。

这则记载所涉诗稿和诗主颇多，从郭氏书房中检出的各书中的诗作，之前

①参阅《湘雅摭残》一书中周铨治诗作前小传，岳麓书社，1988年，第398页。

②见光绪五年十月十五郭的日记，《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950页。其时，郭长孙年方十三岁，两人至光绪十二年九月十六日方完婚。见《郭嵩焘日记》第四卷，第657页郭当日所记。

是否已被选入续集稿本,亦不可知。今查馆藏稿本,见王逢年诗十九首,收于《续编》卷百四十;言友恂诗六十首,收于卷七十九;赵璘诗四首,收于卷八十八;郭新楷诗六十五首,收于卷百十九。另王祚隆诗二十首,收于《沅湘耆旧集补》卷四。

该年郭氏日记中关于续编的另一记载见于八月廿一日,记曰:“亦接周荔樵、黄柚生二信。又致周荔樵、钱子宣、王益吾三信。致荔樵信以冯树堂遗诗五册交之。”检视馆藏稿本,卷一百零七收有冯卓怀诗八十一首,小传题“卓怀原名作槐,字树堂,长沙人……。”

郭嵩焘晚年多病,光绪十五年以后渐重。十五年九月,郭完成其自传《玉池老人自叙》,言“吾年踰七十,精力衰耗已极,疾病颠连,累月踰时,自度无长视久生之理。”^①至光绪十六年(1890),病情仍未见好转。此时,郭请到清末著名学者王先谦(益吾)主讲思贤讲舍。他本人则忙于搜检自己一生的著述诗文,嘱人整理,并开始安排身后的遗产分配^②。

尽管自知病人膏肓,难久人世,郭嵩焘并未忘记续编之事。在光绪十七年六月初二的日记中,郭写道:“早雨。致周荔樵信。以《慎庵诗钞》属其补选。致李佐周信,以四十以前抄存诗稿九卷属其鉴定。”^③

这则日记距他病故仅十一天。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三日,郭嵩焘卒于长沙家中。

六、郭嵩焘在续编之业中的角色

续编之役,旷日持久。从咸丰十一年(1861)或同治元年(1862),郭嵩焘嘱罗研生接续其事,到周荔樵于光绪乙未(1895)终于成书,经历了三十三、四年之久。根据伦明之说,郭本人之前尚费“二十余年之力”^④。邓氏所编《沅湘耆旧集》和《沅湘耆旧集前编》分别刊刻于1843与1844年。可见,郭嵩焘在邓著问世未久即已开始为编纂《续编》收集资料。如此算来,续编的工作,断断续续,竟长达半个世纪左右。而这部书稿之所以能历尽沧桑、经众人之手而未辍,所赖者郭嵩焘也。事实上,该书编纂的时停时续,是与郭嵩焘仕途上的几起几落密切相关:郭仕途受挫,退居湖南,编书之役乃进;郭再获启用,重返仕途,编书之役则停。通观郭氏多年在续编一事中之所为,可知他既是总策划,又是总指挥,还是总督导。即使是在有王闿运这样博学能干之人执掌其事的时候,郭

①《玉池老人自叙》,《自序》叶一,光绪十九年养知书屋本。收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二辑。

②《郭嵩焘年谱》(下),第998-999页。

③《慎庵诗钞》为左宗棠的哥哥左宗植的诗集。左宗植的诗七十四首收于馆藏稿本《续编》卷九七。

④从正编刊行(1843)至郭离开湖南襄忠局(1862),将续编之事嘱予罗研生,实不足二十年。伦明此处或欠精确,或将罗已参与其事的部分年月亦算入。

也仍然没有完全放手。在王闿运的日记中,就两次记有郭嵩焘专程找他谈选诗的事。一次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二月十九日,郭亲登其家门,“来言选诗事”。一次是在同年的四月三十日,记郭嵩焘和监院周荔樵一起来思贤讲舍找王“言选诗事”^①。郭这种总理其事的角色和在诗人之取舍方面所具有的最高决定权,外人也是非常了解的。因此,那些希求把自己先人、亲朋的诗作选入《续编》的人都知道必须找郭嵩焘,获得首肯。另外,续编之役工程颇大,在每一阶段,都需要有财力的支持才能开展。这方面更是舍郭嵩焘他人难以担当。正是凭着郭在官场上的影响,地方上的人脉,以及职务上的便利,才得以借编纂《褒忠录》之便,囑罗研生兼为《续编》收集资料;又借设局编纂《褒忠录》、《湖南通志》之势,邀包括吴南屏在内的多人参与《续编》的工作,使之取得重大进展。即使是在告别仕途,归隐回乡之后,郭仍然凭借多年建立的人脉和影响,取得了地方官员、富贾和乡绅的支持,开办了思贤讲舍,也得以将续编之事开展下去。应该说,没有郭嵩焘主其事,就不可能有续编的经年而不辍和最后的成稿。统观郭嵩焘在续编中的作用和所做的贡献,如果《续编》在郭有生之年成书,他署以总纂或编纂者之一,应是当之无愧。而从当时编纂《续编》的进度看,也完全可能竣其事。那么书稿何以未能在他生前完成呢?笔者的分析是:非不能也,实郭嵩焘无意于此。为何郭操持半生,而又不做该书的总纂呢?答案是,他希望把自己的诗作收进《续编》之中。

前面提到邓显鹤《沅湘耆旧集》的体例是“以盖棺为定”,不收在世之人。邓本人的诗就不曾收入。邓的《耆旧集》受到后世湖湘名人包括曾国藩在内的赞誉,郭嵩焘本人也是推崇备至。故《续编》一书,不可能改《正编》之先例。如此,郭嵩焘或署《续编》之总纂,或入选其中,使其诗作得与四朝风雅之士的作品共同流布于世。郭选择了后者。何以见得?所据略考之于四个方面。

第一,倘若郭有意在生前完成此书,他完全可以做到。在《续编》的编纂过程中,至少有过两次可能完成的机会。第一次是在同治末年,续编之役在长沙书局展开,吴南屏再度被拉入,并有“诸公”参与此事。其时“刻钞卷帙,积案盈箱”,可见摊子铺得很大,大有一鼓作气,不成功不罢休的架势。但不巧的是:未几,吴南屏病故。随之,郭本人也奉召入京,不久做了大清国驻外的钦差使节。应该说,这一次郭很可能想完成其事,署为总纂或编纂者之一。但机缘所为,未能如愿。第二个机会是在光绪十四年,其时王壬秋主其事,并有周荔樵佐之。工程在思贤讲舍前厅摊开,除王、周二人外,还有至少七人参加校对和缮写。此外,还有郭庆藩数年前就编好的续编、补编的目录作为增补、删削时的参照。应该说,郭在此时若想把稿本的编校毕其功于一役,是完全有条件的。

第二,郭将自己的诗留入《续编》是他要把郭氏家人的诗作一体入选的一部分。郭嵩焘在光绪五年(1879)七月初一的日记中写道:

^①郭平常居家,并不常到讲舍来。

七月初一日癸酉。意城汇集先世遗诗,仅及三十章,谋刊存之,属为一序。而观其所自叙,与予所言参差,其搜集实由意城,予可以不复叙论矣。因令楷书遗诗,并录存先世志传于前。诗虽少而藏书家亦得据之以为珍玩,则亦足以长存也。祖父鸿渚公得诗一章,叔祖葵臣公得诗二章,本生祖父吉皆公稍多,亦不逮二十章,先光禄公十章而已。楷书刊刻,工本稍费,予力尚能任之,令意城精缮见交。其诗已大半选入《沅湘耆旧续集》也。

意城为郭嵩焘的大弟弟郭昆焘。文中谈到的本生祖父郭吉皆为郭嵩焘的亲生祖父,而这里的祖父郭鸿渚是指郭嵩焘的二伯祖父郭世遵,因其早亡而无子,故将郭吉皆的儿子郭家彪过继给他。不幸家彪早卒,遂把吉皆的另一个儿子郭家彪再过继给他。郭家彪就是郭嵩焘的父亲^①。《郭嵩焘诗文集》中收有《意城书刻家集跋后》一篇,所跋即为日记中谈到的家刻先世遗诗集。盖郭以意城自叙颇详,他“不复叙论”,而以跋后略表其意。

检视馆藏稿本,《续编》卷九收“郭赠公诰世”诗十六首,小传云:“诰世号吉皆,湘阴人。……孙嵩焘官侍郎勋赠光禄大夫。”卷十收“郭赠公家彪”诗十首,小传云:“家彪号春坊,湘阴人。议叙八品,以子嵩焘贵,累赠至光禄大夫。”再检稿本《沅湘耆旧集补》,见卷十四收有“郭赠公世遵”诗一首,其小传云“世遵字佐平,别字鸿渚,湘阴人。……以孙嵩焘官广东巡抚,赠如其官。”同卷又收“郭侍读诚世”诗二首,小传云“诚世字葵臣,湘阴人。……”

如此,郭嵩焘日记中提到的郭家四位长辈的诗均已收入稿本。而嵩焘三兄弟中两个先他而亡的弟弟的诗作也都选入了稿本。大弟郭昆焘,卒于光绪八年(1882),其诗三百八十七首,收在卷五十一至卷五十三内。小弟郭仑焘,卒于光绪六年(1880),其诗七十首,收于卷百四十四中。甚至连他最寄厚望,但却早亡的大儿子郭刚基^②也有八十五首收在《续编》的百八十四卷。试想,郭嵩焘对其家族的诗作在稿本中安排得如此周密,难道会唯独将自己的诗置于《续编》之外吗?

第三,将著作留之于后世,是郭嵩焘风烛残年念念于怀的心事。光绪十五年以后,郭嵩焘已是年老气衰,疾病缠身。三月初十日,他一夜剧咳,难以成寐。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是夕苦咳,不寐且汗,感率成句:成仁取义生平志,老死柴门亦数然。岂分三医连四表,竟愁一药送余年。惭无身后完存稿,尽有人间未了缘。病亦无名人更幻,此身原不落言诠。

意识到自己可能来日无多,郭担心死前会来不及处理完一生的文稿。正在此时,王先谦读了他初十的诗作,与郭联系,愿帮他审订其文稿^③。此事记于郭十五年三月廿九的日记,云:

①参阅王兴国:《郭嵩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26页。

②郭刚基卒于同治八年十二月初四,即公历1870年1月4日。

③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

益吾次吾初十夜枕上一律，索予诗文稿为之审定，至是为和答云：枉荷名篇征敝稿，语言郑重意殷然。欲提铅槩从求字，愿向穹苍更假年。延阁道山终有分，儒林文苑恐无缘。乾坤沉浊生悠缪，敢许微词待惠论。

此后，郭加快了对其后事的布署。首先，他抓紧撰写自传，终于在十五年九月成稿，取名《玉池老人自叙》。之后，又两次为《自叙》添写新章。同时，他聘请王先谦主思贤讲舍。王于光绪十六年年初到任后，即着手恢复思贤书局，出版经其检校过的郭之文稿。当年就以思贤书局之名刊刻了郭的《礼记质疑》四十九卷，《大学章句质疑》一卷，《中庸章句质疑》二卷。翌年又刻郭嵩焘的《校订朱子家礼》五卷^①。《郭嵩焘诗文集》中收有《〈礼记质疑〉自序》、《〈大学章句质疑〉序》、《〈中庸章句质疑〉序》各一篇，均署光绪十六年六月朔日撰。又有《书〈中庸章句质疑〉后》和《〈校订朱子家礼〉序》各一篇，未署撰日。在光绪十六年五月廿九日郭的日记中还记有：“以检校《礼记质疑》一书，谢客一日。”十七年四月初六的日记又有“《家礼》之久经刻成”的记载。

光绪十七年五月之后，郭沉痾愈重。在五月廿六日的日记中，他写道：“王益吾见属检存文稿交渠订正，勉强搜辑一日，得文百余篇。精力衰惫，不可支矣。”廿七日又云：“干咳气喘已逾四月，讫无少减，恐无复求生之望，勉强支持，以文稿检交益吾，为身后之托。”廿八日则记曰：“接王益吾信。检取现存各稿，以类装成六本，求益吾鉴定，并致益吾一信。”在他六月初二的日记中则提到：“致李佐周信，以四十以前抄存诗稿九卷属其鉴定。”可见，郭将文稿的检校嘱之王先谦，而诗稿则交予李佐周了。在六月初七的日记中，郭写道：“复王益吾信，并以杂文一卷，属之清缮。”六月初十日，郭记曰：“接李佐（洲）[周]信。并承阅定旧诗稿四本。病惫已甚，不能复视也。”此时距郭逝世只有三天。在郭嵩焘的诗集中有一组他临终前的诗作，题为《枕上作》。其中一首吟道：“覆瓿文章心自疑，枉蒙知己力维持。稍分经纬留人世，已是春蚕丝尽时。”以上种种，足见郭对将其著作留于后世的关切和所尽的努力。由此推及，他对自己的诗作能否被收入《续编》，一定是很在意的。

第四，郭虽领衔续编之役多年，却不见记之于自叙和墓表。郭嵩焘在《玉池老人自叙》中，对其一生的经历和作为叙述颇详，但对领衔《续编》的事却一字未表。郭故世后，李鸿章为其撰墓表，王先谦作神道碑，对此也是只字未提。特别是王先谦所撰之文列出了郭一生已刻和未刻的著作，并未提及《续编》之稿。可见，郭不仅无意在《自叙》中自表其功，在朋友、同僚之中也不以《续编》领衔自居。

王先谦、周铤诒果然未负郭嵩焘之托。在郭辞世后的第二年，王先谦就与郭生前的另一位朋友杨商农（书霖）一起，整理编订出郭的奏疏十二卷、文集二十八卷和诗集十五卷，合为《养知书屋遗集》刊行^②。周铤诒也在郭卒后四

^①参阅《郭嵩焘评传》191-192页。

^②养知书屋是郭嵩焘晚年居所之一。

年,将《沅湘耆旧诗集续编》书稿完成。根据伦明之说,周笠樵在自序中称“例依邓氏,意主摭佚,如王湘绮辈,亦不及焉。”检视馆藏稿本,不见周氏自序,也无他人之序。但目录卷列《续编》始于邓显鹤,迄于郭嵩焘。郭的诗共二百四十五首,收在卷百五十二至百五十四共三卷中。郭嵩焘之后的各卷则为淑女闺秀、方外释道及鬼仙之诗。可见周铤诒确是谨依邓例,连诗名显赫的旧友王闿运之诗,因其在世,亦不纳入。遗憾的是,周铤诒未能将此书刊行,故未能完全实现郭嵩焘的遗愿。所幸该稿虽历经风险,又辗转海外,却仍存人间。然统检全稿,发现书稿已残。除缺书前序例之卷,郭嵩焘诗三卷、郭昆焘三卷、曾国藩一卷、吴敏树(南屏)三卷、刘蓉一卷和孙鼎臣一卷等亦付阙如,令人扼腕。好在所缺之重要诗主,其诗文均已单独刊行于世。推测序例卷应为卷首一卷。至于稿本卷首之端是否已题有编纂者,则不得而知,但序文无疑应对编纂者与纂书经过有所交代。

从伦明的叙述可知,他是读过周铤诒的自序的。恐怕这也就是为何他对稿本成书之过程能讲得简单却基本准确,但又不完全(如未提王闿运之贡献,推测周序即如此)。他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最初以连载方式,发表于一九三五年的《正风》半月刊^①。但伦明是在此之前读到过稿本自序本身,还是自叙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曾以其它形式存在并流传过(如钞本或部分被抄出),还需考订。检视馆藏稿本,现有全稿分订六十五册。该书入馆时,每册均加盖有本馆财产登录号。从各册登录号连续无间断可知,该稿在入馆时已残。

有意思的是,岳麓书社曾于一九八六年出版过湖南图书馆所藏稿本《湘雅摭残》。该书可说是为《沅湘耆旧集》作续的又一可赞可叹的努力。该书收清道光末至民国初年湖南诗人六百四十三家,诗作近八千首^②。该书卷九收周铤诒、周奎诒兄弟诗共十六首。在铤诒诗十三首之后,有作者评论一段。其中云:

闻笠樵任思贤讲舍监学时,郭筠仙主讲以所藏道咸同光四朝湘人已刊未刊诗稿七百余种,属其续编《沅湘耆旧集》,历五年始成,都二百卷。所选各家诗,悉依原本为先后,不拘五言七言相次之旧。他例一沿邓氏,且意主摭存遗佚,凡力不能自行于世者,录之较多。此稿卒未刊行,展转落长沙易寅邨师家,余曾见之。近闻竟遭匪毁损矣。

这段记述与伦明所记有许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但未言成书之过程,对周铤诒受郭嵩焘之嘱也以“闻”之记述。其全书“都二百卷”之说也不如伦明“都百九十卷”更为准确。但其所记后半段对该书体例的描述,则较伦明更加细致,且十分准确。如《续编》在各诗主下排列诗的顺序不再依《正编》的先五言后

①见《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出版说明。

②参阅《湘雅摭残》出版说明。

七言的旧例^①，但其他方面仍一沿邓例。而且，作者张翰仪直言曾在易培基家见过此书。莫非此时易之所藏已缺序例之卷？抑或张氏在易家只翻看了某些诗作，并未读周氏自序？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考证。

七、尚待解开的谜团

至此，本文前面所举伦明先生留下的疑团，经仔细考证，已一一解开。然还有两个谜团，虽已超出本文范围，但仍需有所交代。其一是伦明所言《续编》之二。即：

同时有吴称三德襄者，同时受侍郎之属，同时葺事，但异其名曰《道咸同光四朝诗抄》，实一书也。稿为醴陵傅钝安所得，终于丁巳七月长沙日报之火。

无独有偶，《湘雅摭残》一书中，也有相关记载。该书卷七收吴德襄及子吴新佑诗共十三首，德襄诗前小传中记有：“……生平著作等身，其未刊之《群经考证》暨所辑《道咸同光四朝湘人诗抄》，原稿在傅钝安师处，惜毁于民国六年七月《长沙日报》之火。”

吴德襄字称三（1821-1908），号笋樵，湖南醴陵人。由咸丰拔贡授城步教谕，先后在宝庆府学、永州府学和醴陵渌江书院教授讲学凡四十余年。为学长于考证，藏书积五万馀卷，校勘笺释，丹黄满纸。所藏金石墨拓亦数百种之多。有《石笋山房诗钞》六卷等刊行于世。

吴与郭嵩焘相识多年，相互之间也有来往。但令人颇为不解的是：第一，续编之举，工程颇大，所费时日和所需人力、财力，从馆藏稿本成书之艰难可见一斑。为何郭嵩焘要同时嘱两班人马而为之？而且，搜求所得或诗主亲朋呈交的底本常无副本，若两处行事，当何以处置？第二，郭从年轻时就养成记日记的习惯，起居见闻，出访迎客，大事小情，信件来往，无不记其详。特别是郭嵩焘从英国还乡归隐后的日记十分完整，直到其去世前一日，几乎每日都有，但笔者却没有找到关于此事的记载。在《郭嵩焘诗文集》中倒是有《石笋山房记》一篇^②，记郭到醴陵时访吴称三所居石笋山，惊其宅“林园之胜甲一邑。有亭翼然，有溪澄然”。我们又知吴喜欢收藏，图书之外又好金石法帖，所费必不菲。可知他家境富实非一般，又珍爱图书。莫非郭嵩焘有虑于周荔樵家境欠殷富，恐其无力将《续编》付刊而做的另一部署？倘若如此，郭必应有所交代。但遍检郭自光绪五年回乡后至去世前凡十二年的日记，只找到有关吴称三的五、六处记载。其中

①邓显鹤《沅湘耆旧集》收诗依乐府、古体诗、近体诗之序；古体诗中又依先五言后七言之序；近体诗中则依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之序。检视《续编》稿本，收诗顺序无定序，盖如张翰仪所言依搜求到的各诗集原本已有顺序为次。

②除《石笋山房记》外，《郭嵩焘诗文集》中还收有《跋吴称三所藏徐星伯收辑诸家尺牍册》一篇和《〈石笋山房诗〉为吴称三作》诗一首。

有光绪六年九月吴称三来信,为其子吴新佑求人思贤讲舍一条。光绪八年八月十五日,郭邀包括吴称三在内的多位朋友晚宴,行中秋之会一条。这之后在郭的日记中多年不见吴的名字,直到光绪十四年才又有三条记载。其中两条分别记于六月廿六日和六月廿七日。廿六日记吴称三来访,“述及刘希陶以陆氏事,致与沉梦兰、刘彦臣抵牾特甚”。廿七日则记“接吴称三信。”并回访吴称三处,“吴称三录示冯梦华论学书,语皆朴实有着落。”这两条记载了吴到长沙,顺访郭嵩焘。两人一来一往,所谈均有所记,并未提及续编之事。而在同年日记中找到的第三条,记于十二月初四,仅云:“接吴称三信。”而且自此至郭嵩焘去世的二年半期间,在郭的日记中再未找到有关吴称三的记载。从郭记日记巨细无遗的风格看,漏记此事,几无可能。而郭吴两人绝非密友,来往也不多。这使郭将此事同时囑之于吴的说法,令人匪夷所思。莫非吴称三所辑《道咸同光四朝诗抄》并非受囑于郭嵩焘?《湘雅摭残》的作者张翰仪就不曾有郭囑之说。未知伦明所据为何?

第二个谜团是笔者在查考资料中找到李元度撰《〈沅湘耆旧集续编〉序》^①。李序云:“于是武陵杨性农驾部有《耆旧续编》之选。既迄事,命元度缀言简端。”可知,此《续编》为湖南武陵人杨性农所辑。

查检《湘雅摭残》,卷五收有杨彝珍(性农)诗二十首,但诗前小传和诗后评论均未提到《续编》之事。倒是全书前的“弁言”中写有:“厥后^②,常德杨性农、湘阴郭筠仙、永明周荔樵、吾邑吴称三诸先哲,相继从事补编,哀然成帙,未付剞劂,先后沦亡。”

杨性农(1806-1898),名彝珍,字性农(又作杏农),又字湘涵,湖南武陵(今常德)人。道光十年(1830)中举,道光三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改兵部主事。杨长于诗,喜古文,其诗文之名尤显于湘西。他晚年专心讲学著述,有《(同治)武陵县志》、《移芝室诗文集》、《紫霞山馆诗钞》等传世。当年邓显鹤编纂《沅湘耆旧集》正编时,杨曾与罗研生一道佐之,邓在《耆旧集》自序中曾予鸣谢^③。杨与郭嵩焘是多年的朋友,相互交往频繁,见之郭的日记。《郭嵩焘诗文集》中亦收有《次韵杨性农见赠》等诗三首。

李元度《〈沅湘耆旧集续编〉序》未署撰年,但云:“道光癸卯,新化邓湘皋学博选《沅湘耆旧诗集》,因地以为断,盖古国风之遗也。同治初,湘潭罗研生中翰选《湖南文征》,与诗并行,如骖之靳。顾自癸卯(汜)[讫]今,余三十年矣,作者代兴,……”。又云:“湘皋、研生、性农三先生,俱与曾文正雅故。湘皋卒,文正表其墓,于《耆旧集》三致意焉。《湖南文征》成,文正特为之序。惜不及见

①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569册。

②此处“厥后”是指邓显鹤编《沅湘耆旧集》之后。

③李瀚章:《湖南文征序》,《湖南文征》卷首,同治十年(1871)原刊本,叶二。

《续编》耳。……”道光癸卯为1843年,是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刊刻之年。自其时起“馀三十年”,应该是1873年之后。另外,曾国藩卒于1872年,亦可作为佐证。自1843年起至1883年,为四十年。故该稿必成于1873年至1883年之间。惜该稿亦未得刊刻。

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又字笏庭,湖南平江县人。道光三十三年举人,官至贵州布政使。李与郭嵩焘是多年密友。光绪七年(1881),郭嵩焘年方十岁的二儿子焯莹(炎儿),由张力臣提亲李次青的女儿^①,自此结为亲家。李与郭过从甚密,见之于郭之日记。郭的诗文集中收有郭所撰《李次青六十寿序》一篇,《覆李次青》书信一通和《与李次青方伯论吴有汉昌郡无吴昌郡》一篇。

以郭嵩焘与李元度和杨性农的关系,郭不可能不知道杨性农所辑《沅湘耆旧集续编》一稿。至于该稿与郭领衔编纂的《续编》有何关系,则有待考证。

八、结 语

郭嵩焘主持编纂《沅湘耆旧诗集续编》的往事,由于该书未得刊刻,几乎在百餘年来所积起的历史尘埃中归于湮没。他倾半生之力,得多人辅佐,共同搜集甄选的一千八百餘湘人的一万八千首诗作的大部分,也因该稿本不知下落,几乎随如烟的往事灰飞烟灭,陷于沉寂。伦明先生七十多年前发出的慨叹,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受到他的失望与无奈。

本文以伦明先生所记为线索,考之于各种历史文献,特别是郭嵩焘的日记和他的诗文,再核之于馆藏稿本,终于得以将《续编》成书的大致经过,主要的参与人员及郭本人所起的作用基本理清。而稿本的存世也可使千餘湘人的百年诗作重得彰显,再获传世。有感该书成稿之艰难,存世之幸运,谨依原韵,改伦明先生诗,作为最后的结语:

沅湘耆旧有续编,经年不舍赖筠仙。

百年文献聚非易,幸存海外未成烟。

作者工作单位: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

①订亲参阅郭嵩焘光绪七年六月廿五日的日记。郭子与李女于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十三日完婚(其时李元度已故),参阅郭该日日记。该两则日记分别见《郭嵩焘日记》第四卷第184、998页。